

44203/31
編者的話

我县文史资料的又作，是根据周恩来主席对各方老前辈人士提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与后代”的精神，在中共简阳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和上级政协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的。

我县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成立以來，除于一九六二年出刊了“简阳县自然灾害历史资料”专辑外，因故暂停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召开了老年人士座谈会，继续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又作。四个多月来，由于大家的热烈支持和积极撰稿，已先后收到稿件数十篇。现经选录整理全部修资料，编成“简阳文史资料（第一辑）”出刊。余稿又在选录整理中，今后将继续刊出。

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地方历史资料，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古为今用。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够翔实，观点可能不够正确。因此本史辑，目前除给全国和省文史资料研究会提供资料外，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的刊物发行。以供关心和研究这一史料的人士参考。更欢迎提供补充和订正。

文史资料又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而丰富和发展这项文化建设，亟须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希望进一步响

在周恩来主席的号召，继续撰写资料，积极投稿，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整理资料的人员，限于水平，所整理的资料，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

公元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日

目 录

伪中政校受训片断	高同祺 (1)
伪阳“信城”的起源、发展及其罪恶活动	
-----曾兆姜、华次瑞 (已故) (18)	
回忆伪阳临时参议会	李国瑜 (23)
战匪临渊罪行的片断	钟尔康 (29)
伪阳伪参议会的成立和历次选举的形形色色	
-----曾兆姜 (34)	
伪阳伪国大代表、文该委员选举的片断	
-----曾兆姜 (41)	
石林商场旧社会的恶习	李梦余 (43)
“德兴裕”的兴衰和衰落	陈宇群 (49)
回忆“金山烟厂”	周仲群 (60)
契治平和平武乡国民党区分部	陈英俊 (73)
解放战争中恶棍匪首契回维的罪恶活动	
-----陈英俊 (78)	
艺人生活三十年的回忆	
-----钟华彩口述, (钟尔康笔记整理) (89)	
施家乡哥老会的概述	李朝林 (118)

伪中政校受訓片斷

高同根

我在伪中政校受訓，这是1940年的事情。距今已是二十多年了。那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段生活史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些活动情况和法西斯教育如何培养人材，还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本质和反动政府官吏的丑恶面貌。所以仍然是值得回忆的。只是时间隔久了，仅凭脑子里留下的点滴印象，写了这篇文章。虽然得到冯蔚圃（我受訓時，他在大学部讀書，1942年毕业）彭瑞生（中政校的前身，国立政治大学毕业）两位老师的帮助，提供了一些思考线索，湊合了一些有关情况，但还难免没有錯誤。希望知其内幕者予以指正。

（一）升官捷徑

我是参加伪考試院民國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高等考試教育行政人員考試备取而去受訓的。还得从投考写起。

那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經被迫抗战，退到四川。为了维持它的统治地位，笼络知识分子，所謂不致“誤入歧途”。又举行了已經停止几年的高等考試。

我从省立成都师范毕业，就在成都市立第一小学教书。走的是旧社会认为的读书人的末路。听说高考是升官发财的捷徑，正合我“向上爬”的志愿，就报名参加。可是投考资格是：（1）大学毕业；（2）普通考試及格；曾任行政工作三年以上；（3）高等考試檢定考試及格。前三条

（即高中毕业）

我都没有资格。只有争取最后一条。恰好那年夏天，传四川省教育厅受伪考试院委托，举办高考的预定考试。我就检齐证件，前往报考教育行政人员。经过几十天的赶考，三天的苦战，取得了高考的预考资格。却害了一场大病。参加各类考试的，多半是低级公务人员和小学教师，共有三百多人。及格的只有八个。

同年秋天，载我伪考试院定期举行民国二十八年高等考试的计开。有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会计统计人员；外交官、司法官等各类。教育人员的考试科目有十科。成都是一个考区。我大病初愈，又有教学工作。加以有些科目完全没有学过，本想等待来年再考。当时许多师友极力打气。所以我又拚命赶考。这次参加考试的，只成都一区就有五百多人。绝大多数是中学教师和中低级公务员。每天考三科，考了三天半，真是考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有在考场上就晕倒的；有未终场就打退堂鼓的；还有说“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的确，那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一条是反革命的路。觉悟了的人，要求抗战救国，就跑到延安去，这就是前一条路。如成都市小校医赵嵩寿，省师同学郭先泽，邓承泽，他们就走的这条路。不觉悟的人，想升官发财，就前赴重庆，这就是反革命的路。我选择了参加高考这条“升官捷径”，就走的后一条路。

以往几届官考及格就分发工作。“金榜题名”，“榜下知县”，倒是捷径。这届可不同，还有一段路程。须到中政校受训一年。程度

(又)

試及格，才能令發。快到年底，報上揭曉考試及格人員名單，各區共錄取七十多人，名單末尾有了我的名字。我也覺沒喜出望外。不久，我接到偽考選委員會和偽中政校的聯合通知，限在1940年元月底以前到重慶小溫泉校本部去報到。我就這樣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二) 大學之大學

偽中政校的全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政治學校》。它的前身是《黨校》，為國民黨反动派培養了許多靠吃黨飯的黨棍。改名後，当然是要為國民黨反动派訓練更多的各方各的政治奴才。

1940年2月1日就開始軍事訓練。天天和我們打交道的只是軍事情官。隨后才舉行開學典禮，由教育長陳果夫主持。這個鼎鼎大名的所謂“黨國要人”，原來以為如何魁梧奇偉，見了才美鴉片煙鬼，說不到幾句話就要咳嗽，聲音也小得可憐。真是貌不驚人，言不壓眾。說也奇怪，不但受訓的學員，就是所有的高級職員如張道藩（教務長曾任什麼部長），蔣志澄（訓導長，曾任偽四川省教育廳長）等々，都一律必恭必敬地肅立听訓。還有人專門跟他送開水、拿痰盂。我猜他是公差，有人告訴我，他不是公差，而是訓導員楊萃一。大說他拿痰盂有“功”，以後還當上了交通部的司長。

陳果夫的長篇訓話，當時我沒有全听懂，至今還記得一句，“中政校是大學之大學”。大乙是，校長是黨的總裁蔣中正。這就不是一般的大學。受訓的學員都是國內有名的大學畢業生，經過國家考試選拔的。所以是“大學之大學”。

更令想來，“大”，还不在于此，“大”还在于有个庞大的官行机构。校长下设有教育长都是挂名，很难到校。教育长下设有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人称三大巨头。也只画诺、不常办公。其中，总务长项致庄，不久就跑到南京投靠汪精卫伪政权。实际拿钱做事的人，还在三大巨头下边的“员”字辈。如：教务员、训育员、总务员等。校本部原设大学部，军训部，研究部，毕业生指导部，我们去受训时，又附设了公务员训练部。另外还附设有专修科（在仙女洞），地政学院（在白鹤林），边疆学校（在界石坊）。各部、科、院、校都有主任。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以后还有普通科，是训练普通考试及格人员的），主任是考选委员张忠道。光是校本部的职员就有好几百。大的职员不是当过部长、厅长，就是当过旅长、团长。小的职员也是专员、县长、营长、连长。这不是一个庞大的文武官行机构是什么？

“大”，还在于学科的庞杂，讲师是当权人物。只拿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来说，就有总理遗教（原是中央委员邵力子讲，邵氏致苏大使后，由宣传部长陈立夫讲），财务行政（财政部长孔祥熙讲），司法行政（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讲），计政制度（主计长陈其采讲），教育制度（教育部司长顾毓琇讲），外交仪法（外交部秘书凌其翰讲），考选法规（铨叙部次长马洪焕讲），应用文（考选委员会付委员长沈士远讲），等。这不是大杂烩是什么？

我以为教育行政人员只听讲教育制度，殊不知才样样都要听。据

說，這是訓練“通才”。專門學問都早在大學里學好了，只是“專才”。到大學又大學來，夜該通曉反動政府的各種法令規章制度，才叫“通才”。在上課時，許多人都和我一樣，不感興趣，沒精打采，听不懂就打瞌睡。課前課后，卻又不同。有很多人非常活躍，擠到講師休息室拉笑話，談這些“大官”題字。朱健（巴縣人，四川教育學院畢業）有次还把“大官”題的字向大家炫耀，談笑！部長都稱我“天行兄”，還說，替我取這字，是根據“天行健”這句古語呢！也有人私下議論，這個講師怎樣，那個講師怎樣。還有些尖酸刻薄的刻劃人物的對聯，如：

“蔣志濃地營狗苟；張道藩粉面油頭。”

“凌小丑只營講吃、講穿，動則搖頭擺尾，活象獻媚的小花狗；
孔大人吸吮民脂民膏，長得心黑體胖，真是該殺的大肥豬。”

可見當時受訓的人，變炎歎勢的圓多，仇恨不滿的也有。

（三）蔣家天下陳家黨

這句話，我受訓前就聽人說過，只當耳邊風，還不懂個中道理。受訓時，聽到早已入党、當家多年、五十多歲的鄭方叔（福建人，曾任偽縣府科秘）講他還要參加高考，還要來受訓的原因，才明白這句話的實在意義。

他說：“當大官要有真資格，要有后台老板。普通的國民黨員遍街都是，找不到它做的官，有了派系關係，才有靠山，才能升官。

我在官场中混了几十年，还是个‘小吏’，当‘帮办’，就由于没有具备这两个条件。”言下不胜感慨！

他还说：“我们教育长两弟兄，自成派系，身居要津，把持一切。单说教育长又是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又是侍从室第三处的主任，各省党政大员都听其门下，真是内主政吏遍天下。蒋家天下陈家党，那个不晓得？到这个学校来受训，我们的校长是陈总裁，我们是教育长的门生，只凭这张毕业文凭就不少官做，何况还要拿到国考及格证书，再拉上点特殊关系，当大官就有了指望！”说得眉飞色舞，怪不的他也来磨老骨头了。

此人不仅爱讲“官话”，还爱给人看相。一下课就把圈子围起了。有人曾经问他：“你给别人能当什么官，你自己呢？”他说：“能当个专员”。结果他连县长今发，都没当到。大概还没有拉上关系，自愿留在学校当训育员。

访友话完回来，中政校既是“陈家党”训练喽的又臭，来受训的人自然都非入党不可。所以凡来受训的人，一进校都要填写一张详细的履历表，送给军训部的小队长审查。还要写份详细的自传，送给训导处的训导员审查。记得我那小队的队长钱凌珩给我的表上没有填写何时何地参加国民党，就打麻烦，三番两次，寻根究底追问个明白。我那小组的训导员章微颢（浙江人，曾在蒋志澄当四川教育厅长时做秘书），看了我的自传后，找我个别谈话，说和雷咏夫（我的革命叔父，曾在蒋任内当过教育厅长）相熟。关照我要马上填写入党中

请表。表上要三个介绍人。我就请张法炳（内江人，普考及格，曾任教厅科员）和同寝室的潘鹤松、陈怀容介绍，填好送去。

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举行宣誓典礼。两百多人中参加“宣誓的”只有二十多个。其余的早已入党。传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宣誓，讲了国民党的党章。陈果夫训话，他指着礼堂墙上的“忠党爱国”四个大字说：“唯一的理论是、三民主义，唯一救国的政党是‘国民党’。党就代表国家。必须忠党，才是爱国。今天宣誓入了党，就该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样效忠党国……”。随后发的党证是“特字”多少号。介绍人都说：“这个比我们‘训字号’‘渐字号’的关火。中央党部发的要高一等。当官更可靠”。

中政校内的党组织，是直属的“特别党部”。高等科共三个党小组，下分小组，是依官考类别编的。如我同组的十几个人都是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及格的，正取备取的都有。每周有几天下午都要开小组会议，讨论的都很少是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每人都发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总裁言论集》《国民党重要宣言和决议案》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熊文主义哲学的基础》以及《五种道规》《六大政治家》《曾胡治军语录》等一大堆书。限定时间阅读，要加圈点、节录大纲、作阅读心得、送到导处审查。讨论题由训导处公佈，讨论时各组的训导员都要出席指导，记下每个人发言的要点。主席记录，开始由训导员指定，以后就轮流担任。记录册也要送到导处审查。这些都是考试成绩的重要资料。

每次开会，我都如坐针毡，不像上课那样自由。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所谓“坐而论道”的讨论生活。何况学的只是“以党治国”之道呢。所以别人言谈幽默，谈笑风生，我却无言可发，自惭浅薄。不说当不來主席，就是当记录听不懂南腔北调，也甚困难。我在开会时，总陷入胡思乱想之中。在小学经常听到“又教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在这“大学”里，却只听到“微风吹动她的头发，燕子心说的什么话”的小调。党校如此，党国可知。我真不懂他们说的什么话！

(四) 死、失踪和默退

所谓公务员训练，训练的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给国民党反动派训练奴才，给“陈家党”训练走狗。训练的内容，不外两项：军事训练，行动上的奴化；政治训练，思想上的毒化。小队队长和训导员，就是具体执行的人物。

公务员训练部下辖单独一个大队，兵取两个中队，备取一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几个小队，一个小队有十几个人。每小组编组不同，不按考试类别编队，而是混合编队的。即一个小队中有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会计统计人员、也有外交官、司法官。事先就编好的，进校报到了就归队，同住、同吃、同行动。

受训的两百多学员，只有李曙萍、黄允中两个女的。其余都是男的。男学员中，年龄大的有五十多岁，小的二十多岁。不管男女老幼，跨进校门，就解下便衣，换上军装，拴起腰带，打起绑腿。一向

自由散漫惯了的人，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比上了足镣手铐还难受。

大队长（徐州人，忘其姓名）威风凛凛，官气十足。一到操场，中小队长都肃然如虎。他第一次讲话就说：“你们虽为文官，也要懂得军事。到前方当官要带兵打‘共匪’，在后方当官，也要带团打‘土匪’。”原来军事训练就为这个！他说：“军人就要绝对服从，命令就是纪律，违犯纪律，就要受处分。你们应该象中队长、小队长一样服从命令。”是的，他们都很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可是这些“文官”却不大听话，喊了立正，还没有站好；吹了口笛，还不放下碗筷；吹了灭灯号，还不就寝。违犯了军纪，轻则罚立正，重则关禁闭。这真是训练奴才是什么？

那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重庆，一发警报，就停止军事演习，紧急集合，躲到防空洞去。行动迟缓的还要挨骂受气。晚上没有警报，也要紧急集合。不准开电灯，只有摸黑穿鞋跑路，没有谁敢迟到。有一次三名，少一个尹锡章，队长到寝室清查，他从铺上跌下来，折断了肋骨，卧地呻吟。还骂他自不小心。结果气愤死去。第二天，看到礼堂黑板报上出现了：“列入黄泉，炼成白骨，还没当官，却变野鬼，无理服从，伤哉痛矣！”的悼词。更使我感到世道的险恶了！

实在的，在中政校受训，队长的气难受，训导员的气也难受的。老于世故，身经百战的人倒还好些，少不更事，心直口快的人，就脱不了手。从下边的事就可看到。

开校几周，汤镜铭就失踪了。他是巴县人，乡村建设学院毕业，

曾經去過山東。有的猜測他是患了神經病，有的懷疑他天思想有問題。他同組的人又說他是什么問題沒有交待清楚，經不住訓導員的盤問。學校派人到他家裏把他抓回，監視更嚴，精神上的壓力更大，不幾天又偷跑了，下落不明。學校要他家交出人來。聽說，家長還被多保長扣押哩！

过后，甘伯厚（四川人，任教厅地方教育視導員），袁斐（湖南人，曾任基府科長），又被默退了。據說他們有什么“異黨”嫌疑，理由是在小組會上，肯持異議，與人爭論。訓導員制止他們發言，他們還和訓導員叫噓。張道藩還特別到高等科來訓話，說什麼蔣總裁是中華民族抗戰建國的領袖，國民黨是^為中國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奮鬥的最大政黨，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義之內。國共合作，共產黨都要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全體學員都要忠黨愛國，誤入歧途的要及早回頭，不要自尋死路。原來這番政治欺騙的鬼話，就是對他們的警告。後來聽說袁斐跑回湖南，甘伯厚跑到南洋。他們不但沒有升官，反而套了冤。使我更應到歧路撈筏了！

他們幾個，失踪的失踪，默退的默退，究竟為了什麼？誰也不知道。請參，這不是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訓練嗎？

（五）假設“國民參政會”

官方憲法規定考的是《訓政時期約法》。進校受訓，又規定閱讀《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小組會議還討論了“權能分取”的問題。會上，訓導員特別指出，政權歸于“有權的人”和治權歸于“有

能的人”的乙义，以及《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国民党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闭会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经过训政阶段过渡到宪政，这就是“以党治国”的国家法统。当然这些话从今天看来，它的实质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取消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精华，诬蔑人民群众是“无能的人”。而要把受训的人训作为“有能的人”。以便操纵全国国家机器。因此，接着又举行了“假国民参政会”。

这个会，的确是名付其实的“假”的。可以算到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欧美式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但又的确是“真”的，可以算到竞选时投入选票争权夺位的真花样。

这个会，是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和大学部本科共同举行的。单从服装上都可看出它是壁壘分明的两党，同在一个中政演，可是大学部的学生才是嫡系，穿的是黑色制服；高等科学员是旁枝，穿的是草绿色军装。议长、付议长的争夺，各种议案的争吵，就都发生在这“两党”之间。

参政员的产生，是由每个小组各选三人，再由区分部竞选。高等科大约共选出四五十人，大学部也照同样程序进行选举，选出人数目大概相当的参议员。这就是所谓区域选举。还有社团选举，大学部有什么政治研究会，经济研究会，外交研究会，新闻研究会，教育研究会等，都要选出参议员。显然，入政就要超过高等科，因为高等科没有社团组织。名额上“两党”发生争吵，十分热闹。随后高等科就

以考試类别作为社团，补选一批“有能的人”，但名额少于大学部。

在竞选参政员期间，“两党”各有区域，争夺不大，但各“党”内部仍然有斗争的。单是高等科，就用各种封建关系拉票。什么大学的“同学会”，什么省籍的“同乡会”，甚至一姓的“同学会”，都纷纷举行聚会、茶会。我们有十几个“无能的人”，没有参加“同学会”，训导员还派人把我们拉拢来，开了个“小同学会”。因为我们都不是大学毕业，而是省考及格，或是省考检定考试及格，或是省考及格的。尽管考試的界限不同，但同是考試及格，所以勉强称个“同年”。又要区别于本届考試及格各类举行的“同学会”，所以称个“小同学会”。

李曙萍（这家人，训导学院毕业，司法官考試及格）是高等科的大姐，能说会道。大家都称她是“女政客”。她的爱人梁禹九任当县长，又称她是“县长太太”。在竞选参政员时，高等科的“同年”，她都请吃粉、吃花边米。在竞选议长时，不但请高等科的参政员吃饭，还请了大学部四川籍的参政员吃饭。只在下西拉票还不行，名单要经过西核准。她还到训导员、队长、训导长、教务长各处送礼，包括“上司”。花了一两百元的活动费。投票结果，她当选为“付议长”。“议长”被大学部夺去了。韦汝懋（河南人，曾任河南省府秘书，普通行政人员考試及格）抢到了“秘书长”。掌握了实际大权，高等科的参政员们还庆祝这是竞选胜利。

开会时，礼堂前右是参政员席，右右是高等科学员和大学部学生

的旁听席。其它专修科等，也派来代表列席旁听。张道藩还在会上讲了这个“假设国民参政会”的重大意义，是为了推行“新县制”。由下而上成为各级民乙机关的政治演习。心想，这就是所谓“民乙机关”！上自国家大事，下到学校生活，形形色色的议案都有。在讨论时，“两党”唇枪舌战，叫骂声红耳赤，你骂我老奸巨滑，我骂你并腰骨嫩，无奇不有。高等科旁听席上，有的打瞌睡，有的看小说，更多的是对女参政员、女列席代表感兴趣，摇头论足，送枝花。在每天出的新闻上，还可看到有关女参政员住过的大会花絮。这也似乎是欧美议会必不可少的点缀。

(六) 社会调查

叫々嚷々的“假设国民参政会”，前后闹了几周，才把戏演完。接着社会调查的把戏，又开锣了。据说，这也是一项具体的政治训练。是实施“新县制”的内容之一。因为要健全县的各级行政机构，成立各级民乙机关，进行文化经济建设，逐步达到地方自治，就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

首先成立“社会调查委员会”。高等科的各个区分部书记，各个小组的组长，都是当然委员。书记分任正付主席和秘书长。下设秘书、宣传、调查、统计各股。股长由组长充当。训导员另成立指导小组，指导“委员会”，进行工作。委员仍负责和伪重庆市南温泉管理局接洽，准备好一切。

调查的区域是“南温泉管理局”的辖区。也就是中政校的所在地

。纵横二三十里。依原有保甲分若干组，一个大组包干一保，一个小组调查几甲。大组有大组长一人，由委员兼任，负责实际、检查、汇报；还有秘书、统计员各一人，也由统计员兼任，负责写调查报告，统计各项数字；其余学员编为小组，小组有小组长一人，组员二人，进行具体工作。

我们小组的组长王锡庚（河北人，曾任国民党部队的政治指导员）还有个组员就是前文提到请人题字的朱健。大组长王××（江苏人，曾任伪县政府科长秘书）先由大组长拿起函件，率领小组长前去与保长接头，拜访致你士绅，请他们指导帮助。第二天，再由小组长拿起函件率领组员前去与甲长接头，拜访各该甲的士绅。指导小组还交待要跟他们把关系搞好。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仅此一端，也可知推行的是什么样的“新县制”了。

我们调查的地头，在木槽寺，距校将近二十里。正是五黄六月，赤日炎炎。早出晚归，爬山越岭。挨家挨户调查，一天还调查不了几户。因为调查表规定的项目繁多，人口一项，要填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产业一项，要填自耕、租佃、水田、旱地、农具、牲畜等。各项数目非常详细。开头几天，我们是老×实×的调查填写。一般老百姓都怕抓壮丁，隐瞒人口，谎报岁数。更不明白为什么猪、牛、羊、鸡、鸭、鹅都要填在表上，又怕派款。因此走一家要费很多唇舌，才能填好一张表。

随后，大组长来检查，说我们的进度太慢。我们说明了原因。他